

长征中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

——红2、6军团与遵义会议

■ 杨晓哲



蒋介石的指令，有时也不那么好使

1935年1月15日到17日，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“这次会议，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，挽救了党，挽救了红军，挽救了中国革命，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”

从1月7日进占遵义，到1月19日开始撤离，中央红军除先头部队外，其他各部没有行军，没有作战，安安心心在遵义地区休整了12天。

遵义位于乌江北岸，乌江像一道弧线，从遵义城的南边到东边划过。1月2日到6日，中央红军突破乌江，7日占领遵义。前面的国民党黔军闻风而逃，后面的国民党“追剿”军停止了追击，被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。

国民党“追剿”军专为追堵中央红军长征而组建，下辖两个兵团，由湖南省主席何键任总司令。此时，第一兵团湘军刘建绪部半数在湘西“围剿”红2、6军团，半数在黔东裹足不

前；第二兵团中央军薛岳部则在贵州镇远与中央红军稍有接触后，马走西南，直奔贵阳，任由中央红军挥师西北，渡过乌江前往遵义。

是湘军不愿远离本土，因此放弃追击吗？要知道，1936年追击红2、6军团时，刘建绪亲率湘军一直追到云南大理，直到红军渡过金沙江。

是蒋介石企图控制西南地方军阀，授意中央军进驻贵阳暂停追击吗？就目前披露的史料看，中央红军抢渡乌江进驻遵义期间，蒋介石不仅没有发出过此类指令，相反还多次电令薛岳迅速渡过乌江，跟踪追击，以求将中央红军歼灭于长江南岸。

梳理一下历史：

1935年1月2日，中央红军开始抢渡乌江。

1月5日，蒋介石发布“歌卯电令”，下令何键“指挥其主力（所部二十团以上）及薛（岳）总指挥两部，应跟踪穷追，协同防堵军，务期于乌江南岸消灭该匪”。

1月6日，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。

1月7日，中央红军占领遵义。同日，薛岳率部进驻贵阳。

1月9日，中共中央进驻遵义。同日，何键下令：“第二兵团全部及第

一兵团之一部，节节尾匪穷迫追剿，务使匪无喘息余暇，并阻断贺（龙）、萧（克）股匪之联系。”

1月10日，蒋介石电令何键第一兵团“以有力部队向黔东追剿”，“第二兵团薛（岳）总指挥及贵州剿匪军王（家烈）总指挥，向北追剿，务在川、黔边境，消灭匪军”。

1月12日，蒋介石下令第一兵团4个师“速渡乌江追剿”，第二兵团薛岳“迅率所部渡过乌江，连（联）络各友军，跟踪追剿，以收聚歼之效”。

1月13日，蒋介石电告薛岳：“遵义应即规复，稍缓恐更难图。”

在此期间，中革军委二局根据破译的敌军电报，确认薛岳“兵团各部皆位于乌江南岸，毫无对我军追击迹象”。

1月15日，遵义会议召开。同日，何键下令湘军两个师“先行肃清乌江以东之匪，相机渡过乌江西岸”，下令薛岳兵团由指定地点渡过乌江，“向遵义、绥阳之线，蹶匪穷追”。

1月17日，遵义会议结束，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。

1月19日，中央红军由遵义南北地区开始北上，国民党“追剿”军两个兵团仍在乌江对岸徘徊。

当天，蒋介石下达新的“围剿”计划，企图将中央红军“压迫于川江南岸地区而聚歼”，命令“追剿”军第一兵团“其大部及第二兵团全部”，限期渡过乌江，“先行扫除涪潭、遵义之匪”，“尔后追击行动愈速愈妙，使匪无喘息余地”。

……

命令归命令，行动归行动，蒋介石的指令，有时也不那么好使。

对于蒋介石令湘军在黔东的4个师“速渡乌江追剿”，何键虚与委蛇，先是打了个对折，只下令湘军两个师“相机渡过乌江西岸”，后干脆将两个师“抽调回湘协剿”红2、6军团，余下两个师驻守黔东“防贺、萧西窜与朱毛联合”，坚决不过乌江。

或为保存实力，或为坐收渔利，薛岳的中央军自追击以来一直跟在中央红军侧后，行动缓慢。当沿途与中央红军频繁交战的湘军转身他顾时，第二兵团若“蹶匪穷追”，势必孤军出战中央红军，这显然不是薛岳的选择。

于是，薛岳一面向蒋介石提出“目前各路友军尚未集结到位”，此时“若以偏师由黔出动，徒促匪入泸（今四川泸州）、叙（叙永，今四川宜宾）间地区，将增整个剿匪军事困难”，一面继续按兵不动，直到2月5日才下令部队开过乌江。

这是一个连锁反应：红2、6军团发起湘西攻势攻城略地，迫使湘军抽调追堵中央红军的大部兵力回身应对，失去友军挡枪的国民党中央军因此暂停追击，从而给中共打开12天安安全窗口，使中国革命完成了历史转折。

好比二马拉车，勒住了一匹马，另一匹岂肯独自负重前行？



1935年8月，红2、6军团领导在湖南澧县合影。后排左起：贺龙、李达、关向应、任弼时。前坐者为王震



西征黔东，红2、6军团胜利会师

让我们从头看一下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。

红6军团西征，拉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。

红6军团是1933年6月在湘赣苏区成立的。湘赣苏区位于湘东、赣西两省相邻的部分地区，与东边的中央苏区隔赣江相望。

1933年秋，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和湘赣等苏区发起第五次“围剿”。1934年4月底，中央苏区重要门户广昌失守，红军在苏区内部粉碎敌军第五次“围剿”已不可能。5月，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，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到湘、川地区。

7月23日，红6军团接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训令，“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，转移到湖南中部

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，及创立新的苏区”，“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2军团取得（得）联络”。

中革军委的意图是：由红6军团先行探路，找到红2军团，联手打开局面，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建立落脚点。

接到训令后，红6军团立刻开始准备，部队由6830人补充到9750人。8月7日，中央代表任弼时与萧克、王震等率红6军团从江西遂川地域向西突围，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多道碉堡封锁线，于8月11日进到湖南桂东的寨前圩，跳出了敌军包围圈。

8月12日，红6军团在寨前圩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关，萧克任军团长，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。当夜，部队继续向西行进，于23日抵达湖南零陵湘江岸边，准备西渡。后因江面太宽，且对岸沿江有敌军把守，渡江未果。

随后，红6军团计划在湖南、广西交界处的黄沙河渡过湘江，再次因敌军已有准备而放弃。

9月初，红6军团进入广西境内。4日，红6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，从广西全县、兴安之间渡过湘江。这段江面，正是后来中央红军抢渡湘江之处。

之后，红6军团进入湘南，下一目标是北上湘中建立根据地，但敌军已在北面布下重兵。

9月8日，中革军委电令红6军团，转向西行进入贵州，然后沿湘、贵边境北上：“规定沿湘、贵边的前进路线如下：即（湖南）绥宁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、天柱、玉屏、铜仁，转向湘西之凤凰地区前进”，“并与红2军团在川、贵、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”。

红6军团此行，实际是中央红军

战略转移的实兵推演。中革军委对红6军团每天的行动路线、到达地点和时间，都有严格规定，并要求红6军团“严令在任何情况必须每日简单明了的电告作战情况”。

9月20日，中革军委来电告知：“据尚未证实的情报，我二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思南、印江、清江并向石阡前进”，“我们的前进路线，特确定：由现地域经清江、青溪、思县（1930年改名岑巩）到达省溪（今贵州万山特区）、铜仁、江口地域。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”。

按指定路线，应在镇远东边北渡舞阳河，但红6军团发现“镇远以东不能徒涉，而沿河敌已有准备”，于是绕道镇远以西，在施秉与黄平间的上游渡河。两个月后，中央红军也从镇远以西渡过此河。

随后，红6军团前卫抵达乌江岸边，准备西渡乌江，以彻底甩掉国民党湘、桂联军重兵追堵，然后沿乌江北上，在适当地点东渡，与红2军团会合。

但是，中革军委出于某种考虑，坚决不准红6军团西渡乌江。萧克后来回忆：“军委不准我们过乌江，是一个失着。乌江是容易过的，乌江以西敌人薄弱，便于我军行动。”

10月3日，中革军委来电：“桂敌现向南开动。据谍报称：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。六军团应照军委一日十三时半电令，迅向江口前进。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。”

10月4日，中革军委再次来电：“军委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”，要求红6军团“应立即向江口前进，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”。

但实际情况是，南下桂军重新北上，并与湘军、黔军一起在东北方向

张网以待，同时由南向北紧逼，企图在乌江东岸围歼红6军团。

结果，红6军团按指定路线北上，正好进入敌军口袋阵，在石阡甘溪一带连续遭到敌军攻击，部队被截成四段。其中第18师52团800余人全部损失，师长龙云被俘后英勇就义。其他三部分别突围，在贵州印江境内先后与红2军团会师。其时，红6军团包括伤病员在内仅剩3300余人。

红6军团此行历时79天，独行2500余公里，途径赣、湘、桂、黔四省，四面受敌，一路拼杀，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蹚出了一条可行之路，其功至伟。

1934年10月26日，红2、6军团在四川西阳（今属重庆）南腰界召开大会，庆祝会师。

红2军团是1930年7月在湖北洪湖苏区成立的，贺龙任总指挥，周逸群任政治委员。1931年，红2军团奉命改编为红3军，贺龙任军长，邓中夏、关向应先后任政治委员。1932年夏，洪湖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红3军撤离洪湖地区，辗转3500余公里，转战到湘鄂川黔边境地区。

由于撤离时失掉了电台，红3军与中共中央中断无线电联络已有两年之久。这期间，红3军受到“左”倾路线的严重戕害，党团组织被解散，“肃反”错杀了大批优秀指战员，部队由鼎盛时期的3万余人锐减到4400余人。

会师后，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，贺龙任军团长，任弼时任政治委员，关向应任副政委，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。

此时，红2军团下辖两个师共4个团，红6军团取消师的建制，部队缩编为3个团，两个军团共7700余人。



湘西攻势的第二拳，打痛了何键

红6军团到来前，红2军团已在川东和黔东的西阳、秀山、沿河、印江、松桃一带创建了黔东苏区。两军团会师后，遵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9月8日“六军团即应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”，“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”的指示，决定立即由黔东向湘西北进军，发起湘西攻势。

红2、6军团离开后，留守苏区的黔东独立师800余人在敌军重兵“围剿”下坚持到1934年年底，终于不支，师长王光裕被俘后牺牲，政治委员段苏全负重伤后失去联络，黔东苏区就此丧失。

红2、6军团进入湖南后，于11月7日占领湘西北咽喉要地永顺城，紧接着16日在永顺以北的龙家寨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，歼灭湘西军阀陈珍新编第34师两个旅大部，击溃一个旅，俘敌2000余人，缴枪2200多支。随后于24日攻占了大庸县城，继而又占领了桑植城，开始恢复湘鄂川黔根据地。

湘西攻势的第一拳，打得行云流水，风雷激荡。

为消灭红2、6军团，蒋介石南昌行营于11月中旬决定，驻守湘北津市、澧县一带的鄂军徐源泉部主力南下，“向常德、桃源推进，协同追剿军一部，围歼萧（克）、贺（龙）匪军于湘西之永顺、大庸地区”。同时调集郭汝栋第26师和独立第34旅，分别从江西、湖北开赴湘西，“围剿”红2、6军团。

在此之前，中央红军已于10月10日开始战略转移，计划到湘西与红2、6军团会合，创建新的根据地。

11月12日，蒋介石委任何键为“追剿”军总司令，统一指挥湘军大部和国民党中央军薛岳、周浑元两部，兵分五路追堵中央红军西进：两路尾追，三路在北面平行西进，绕前截击，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。

11月25日，中央红军沿着红6军团的行动路线，从湖南进入广西。两天后，红1军团在全州、兴安之间渡过湘江，控制了觉山铺到界首之间约30公里的渡河点，并开始架设浮桥。

这段江面本来由桂军把守。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后，以一部兵力西出伴动，桂军误认为红军要夺取桂林，急忙将主力由全州、兴安江防南撤以保桂林，数十公里江面门户大开。

得知红军开始渡江后，何键立刻下令湘军李觉、章亮基、陶广等4个师进入广西，由黄沙河向全州推进，桂军主力则由兴安北上，企图封闭湘江渡河点。

11月29日，湘军与桂军分别在湘江西岸的觉山铺、光华铺与担任阻敌任务的红1、3军团展开激战。

国民党军队中，湘军和桂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。杨尚昆回忆：“那时有这么个说法：滇军黔军两只羊，湘军就是一头狼，广西猴子是桂军，猛如老虎恶如狼。”

在觉山铺与红1军团作战的湘军，甚至打到了军团指挥所门口。聂荣臻回忆：“当时指挥所在一个山坡上，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，敌人已经端着刺刀上来了。”

12月1日，中央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。当天，何键将五路“追剿”军编

为两个兵团，第一兵团湘军7个师等部共45个团，第二兵团中央军8个师、1个支队共32个团。（第一兵团1个师辖6个团，第二兵团1个师辖3个团，个别例外。）

湘江血战，中央红军折损3万余人，几乎全是与湘、桂军交战所致。

渡江后，中央红军循红6军团路线，进入广西西延山区休整。

按照此前预案，国民党军在湘黔桂边境布下口袋阵，企图围歼中央红军：湘军在北，黔军在西，桂军在南，各自构筑多道碉堡封锁线，以达“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，会合川匪（指红四方面军）及蔓延湘西，与贺、萧合股之目的”。

这个口袋阵，最薄弱的是西面，最强厚的是北面。何键令第一兵团李觉、章亮基师协同桂军继续追击中央红军，余部在湘南设置封锁线，第二兵团则向封锁线北面的洪江一带集结，机动堵截。

国民党军的电报被军委二局破译，敌情一目了然。

12月12日，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会议。毛泽东在会上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2、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，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局面。博古、李德等人仍坚持北上湘西，与红2、6军团会合，但迫于敌情，只能“西入贵州，寻求机动，以便转入北上”。

在此期间，为执行中革军委“坚决深入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，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”，“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，向常德、桃源方向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活动”的指示，12月5日，红2、6军团主力由大庸南下，7日进袭沅陵城，但未得手。

随后，红2、6军团主力顺沅江东

进，于16日拂晓向桃源以北10余公里的沅溪河敌军发起攻击，歼敌1个团，继而又击溃由桃源前来增援的两个营。残敌向常德逃窜，红军在追歼中顺势夺取了陬市、河袱，于17日包围了常德城，占领了桃源，并派出一个营向益阳游击。

常德是湘西的政治、经济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，地位非常重要。此时，常德城内国民党军只有一个保安团和独立34旅的残部，如果红军攻下常德，即可南渡沅江，进取益阳，威逼长沙。

湘西攻势的第二拳，打痛了何键。他一面令驻扎澧县的鄂军向南夹击，令郭汝栋师迅速赶到常德，一面急调追击中央红军的李觉、章亮基、陶广师北上驰援。

这3个师在湘军中战斗力很强，曾在湘江觉山铺给红1军团造成较大伤亡。李、章两师还曾一路追堵红6军团西征。这3个师一调走，极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后顾之忧。



“相机”的结果，是“追剿”军两个兵团谁都不肯过乌江

在红2、6军团占领桃源、包围常德之际，中央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。时任红1军团第1师师长的李聚奎回忆：“十二月中旬，大概是在通道会议的一周之后，我一军团先头部队向贵州黎平前进。当时黎平有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周芳仁旅一个团驻守，但他们在我先头部队未到达之前就弃城而逃，溃兵退到十万坪，驻十万坪之敌也跟着向后逃跑，



长征途中，红6军团第17师解放湖南新化县后，团以上干部合影。前排左起：周仁杰、李铨、王震、夏曦、萧克

一直退到五里桥。贵州敌军这种望风披靡、狼狈逃窜的情形，同湖南、广西军阀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些情况，引起了到达黎平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很大的兴趣。”

12月18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作出决定，改变原定与红2、6军团会合，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计划，认为“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，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，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”。

12月20日，中革军委向红2、6军团发出新的指示：“因我二、六军团积极行动，何敌正调动约四个师的兵力向你们前进”，“当湘敌十九（李觉）师主力及十六（章亮基），六十二（陶广）两师已到达常德、桃源附近时，我二、六军团应重向永顺西进，以后则向黔境行动，以便箝（钳）制在芷江、铜仁之薛（岳）敌

部队及在印江、思南之黔军”。

根据这一指示，红2、6军团主力在常德、桃源、慈利一带筹得大批物资、钱款，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后，转身西进，于1935年1月返回永顺地区。

永顺位于湘西北，北临鄂西，西接川东、黔东，进退灵便。此时红2、6军团已发展到1.2万余人，湘鄂川黔苏区初步恢复，其势正旺，已成为何键的心头大患。

1935年1月5日，蒋介石发出“歌卯电令”，部署由“湘鄂边区徐总司令源泉所部”负责“围剿”红2、6军团，同时令何键指挥“追剿”军第一兵团主力20个团以上兵力及第二兵团，“跟踪穷追，协同防堵军，务期于乌江南岸”消灭中央红军。

这显然不足以让何键放心。1月6日，何键致电蒋介石，声称“目前湘西已为剿匪军事要点，必整理巩固，方免顾虑。且萧、贺与朱、毛合，则

其势更张。故拟以第一兵团之一部出沅、白（酉水河）两河流域，实于追剿前途裨益甚大。乞垂察”。

1月9日，何键“基于委座歌卯电令部署”，发布“追剿”计划，下令“我追剿军之第二兵团，应亟与黔、粤、桂友军，协定追剿路线，蹙匪穷追”，将中央红军“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”。

同时，何键下令湘军第一兵团一部协同鄂军和郭汝栋师等部“围剿”红2、6军团，其余大部兵力拉到黔东，沿酉阳、秀山、思南、松桃到铜仁一线修筑碉堡线，封锁红2、6军团西出通道：“如贺、萧股匪企图与窜匪联合，西窜乌江，我第一兵团务期先将该股匪消灭于川、鄂、湘边区，以便于第二兵团协力追剿。”

何键的这个计划，把追击中央红军的担子全部压给了薛岳的第二兵团，第一兵团湘军仅“以第五十三师，迅即跟随第二兵团前进，维持镇远大道之后方联络交通线”，其余兵力全用来“堵剿”红2、6军团，而不是追击中央红军。

这并非蒋介石本意。1月12日，蒋介石电令何键，指定湘军4个师“速渡乌江追剿”，同时致电薛岳“希遵歌卯电，迅率所部渡过乌江，连（联）络各友军，跟踪追剿，以收聚歼之效”。

此时距遵义会议召开还有三天，如果何键、薛岳行动积极，三天内进逼遵义并非难事。但历史跟蒋介石开了个玩笑。

对于第一兵团4个师“速渡乌江追剿”的指令，何键打起了太极。1月15日，何键发布稍作调整的作战部署，下令封锁黔东的湘军两个师，“先行肃清乌江以东之匪”，然后“相

机渡过乌江西岸地区，觅匪截击”，同时命令薛岳第二兵团在指定地点过乌江，向遵义方向“蹶匪穷追”并“侧击由遵义北窜之匪”。

同一天，薛岳致电蒋介石，谏言“勿以偏师由黔出动”，同时告知“目前本路及黔军相机向遵义追剿”。

“相机”，即视情而定。“相机”的结果，是“追剿”军两个兵团谁都不肯过乌江。



红2、6军团的积极行动是导致“追剿”军暂停追击的直接原因

如果说湘军被红2、6军团牵制，止步不前尚情有可原，那薛岳兵团消极避战则另有隐情。根据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》记载，追堵中央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军，“只有湘军行动积极，而位于我军右侧和后面的蒋系薛岳、周浑元部行动迟缓”，尽管蒋介石多次催促薛岳迅速前进切勿犹豫。

1934年12月1日，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的当天，蒋介石即令薛岳：“兄等应努力兜剿，切勿稍有犹豫。无论友军如何，而兄等应出以至诚，以身作率，向前迈进，于此成败关头，更勿可爱惜兵力，贻误良机，并绝对听从何（键）总司令命令为要。”

12月18日，黎平会议召开，中央红军准备开往遵义。蒋介石预判出红军动向，当晚电令薛岳迅速赶到镇远截击：“据报，现匪主力由黎平向剑河、溶（榕）江逃窜。黔军力弱，恐难防堵，希督励所属，克日迅由晃县、玉屏直趋镇远截击，以期一举聚歼。除电何（键）总司令（令）知照外，

希速照办具报。”

4天后，薛岳兵团分两路由芷江向镇远开进。此时，尾追中央红军的湘军已北上常德“围剿”红2、6军团，第二兵团将只身与中央红军交战。

枪打出头鸟，薛岳可不想成为出头之鸟。

当时，从芷江到镇远有大道直通，可以汽车运兵，而薛岳兵团每天行军里程仅20到30公里，几乎成了休闲游，毫无紧迫之感。

12月26日，薛岳兵团吴奇伟部在镇远附近与中央红军后卫交火，次日进占镇远城。吴奇伟部一位参谋回忆：“薛岳部自从江西出发到进入贵阳时止，仅一个营在镇远附近与红军后卫部队有过一次小接触，其余全部是送行到贵州的。用当时薛岳官兵自嘲话说就是：“一路送行到贵阳。”

28日，蒋介石发来电报指责薛岳：“此次进剿镇远，行动太慢，无论友军如何，我军应不顾一切，独立专心进剿，勿使匪立主动，而我反陷于被动也。”

薛岳兵团向镇远开进之时，“友军”湘军只派出一个师在其左后方向剑河“协同攻击”，距离镇远有百余里之遥。

镇远交火之后，双方随即分道扬镳：中央红军经施秉向西北方向前进，渡乌江，占遵义；薛岳兵团则经施秉向西南方向开去，经贵定，到贵阳。

国民党战史这样记载：“第二兵团薛总指挥于（十二月）二十八日抵达清溪。综合各方情报，判断匪军将北犯遵义、桐梓；再图进入川南重建根据地。于是在同日午夜，令第二路军（吴奇伟部）经施秉、黄平向贵定前进；第三路军（周浑元部）经施洞口，在黄平、贵定一带集结。”

1935年1月1日，中共中央在贵州猴场召开会议。鉴于湘军主力已被红2、6军团牢牢拖住，会议决定指出：在川黔边“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（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）作战”。

然而，薛岳并不想单独与中央红军作战。同一天，薛岳下令第二兵团秘密向贵阳推进，并强调“本路军部署，不得向友军宣泄”。

薛岳的密令，再次被军委二局破译。《曾希圣传》写道：“由于二局及时侦收破译了这一密电，让中央红军北渡乌江变得从容不迫了。全军于6日全部渡过了乌江。”

1月5日，蒋介石发布“歌卯电令”，令薛岳所部继续“追剿”。当天，薛岳致电蒋介石，要求在贵阳整备部队。

虽未经蒋介石批复，薛岳仍随吴奇伟部于7日进驻贵阳。中央红军也于同日进占遵义。

之后，蒋介石于1月10日、12日、13日、19日，迭次电令何键、薛岳渡过乌江追击中央红军，二人均不为所动，以各自的方式诠释了何为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。

结果，乌江成了护城河，遵义会议顺利召开。杨尚昆回忆：“红军获得了在遵义休整十多天的时间，这是长征开始以来没有过的。”红一方面军军史记载：“在短短的10多天里，遵义地区就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，使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了补充。”

比对国共双方的相关史料，不难发现这样的逻辑关系：遵义会议得以召开，是因为国民党“追剿”军暂停了追击，而红2、6军团的积极行动，则是导致“追剿”军暂停追击的直接原因。■